

与时代同行,让文学发声

首都文学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记者 张滢莹

12月24日,首都文学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百余位作家共聚一堂,在热烈氛围中共同记忆和庆贺40年来绵长中国文学画卷中的华彩篇章。会议由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主持,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讲话。

铁凝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朝气蓬勃、团结一心、潜心创作、锐意创新,推出一大批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不断迈向新天地、抵达新高度。铁凝表示,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转折。我们生逢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得以见证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既是莫大的幸运,同时也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在过去的40年中,我们的文学生动地书写、积极地参与到了这段历史之中,而在未来,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将一如既往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把改革开放的故事转化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把改革开放的精神熔铸到创作与工作之中,贡献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不断迈向新的高峰。

钱小芊在讲话中指出,过去的40年,中国文学紧紧抓住时代所赋予的发展机遇,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在改革开放40年繁荣发展的根本经验,更是中国文学在新时代创造更大辉煌的根本方向和必由之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文学满怀对未来的期冀,承担着对历史的责任,必将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伟

大旗帜,与人民同心共进,从时代的变革和发展中汲取不竭的生机和活力。

翟泰丰、金炳华、李冰、李敬泽、阎晶明、王巨才、高洪波、廖奔、何建明、陈崎嵘、白庚胜、吴义勤、鲁敏、郑伯农、束沛德、吴泰昌、刘震云、柳建伟、周大新、梁晓声、白桦、包明德、艾克拜尔·米吉提、陆建德、张德祥、关仁山、欧阳江河、刘庆邦、吴秉杰、胡友笋、程惠民、李炳银等出席。

感悟“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的真义

对亲身经历改革开放的作家而言,这40年来的社会变迁是生命中一段悠长岁月,更是许多人的文学人生从无到有,从个人走向社会,从小我走向宏阔的过程。1978年,叶梅正在湖北恩施县的田地里务农,她接过了旁人手中刊有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人民文学》,本想翻三两页,结果不知不觉站在田头一直读了下去,“这个作品给我带来的震动是无与伦比的,40年过去了,我仍深深感到身心从来没有过的那种释放”。从《哥德巴赫猜想》,到《乔厂长上任记》,她感受到文学的巨大魅力,也从那一刻坚定了走上文学之路的决心。除了自身创作之外,叶梅曾任《民族文学》主编。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民族文学》的应运而生,一改之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多限于口头流传的情形,如今则发展至以六种文字出版的丰富刊物,为一批又一批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平台,也将母语版本的《民族文学》带往辽远的边疆人民身边。“作为一个办刊人,我感受到改革开放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巨大激励。”她表示。

而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曾编发

《班主任》和《哥德巴赫猜想》的崔道怡其实了然于心:这两篇作品的面世,显示了文学春天的到来。对一位文学编辑而言,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无疑是当时社会最响亮的一声春雷:“这一次革新与复兴的作用和意义,并非是其词语本身所足以概括和表述的。实质上,它是我们党和国家再次大展宏图的宣告,是历尽坎坷劫难我国亿万英雄重新大显身手的写照。”

在座谈会上,作家朱向前忆及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的创办,正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系主任、军旅作家徐怀中带动下,学员们迎着八面来风的洗礼,山高水低随形发展,保持个性,挖掘优势,培养了一批优秀军旅文学作家。

从1980年代起,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从记录在改革开放初期苍南家乡人民前行的足迹,到着眼于希望工程的深入采访,从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境况,到对新时期海军官兵的倾情书写,黄传会以手中纸笔感悟着“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的真义,与时代同行,及时捕捉时代变革中涌现出的新人物、新故事。

对作家付秀莹来说,40年这个宏大的时间跨度则格外令人感慨,“因为我个人的生命历程,几乎恰好与这一伟大历史时期重合”。她的书写,也是许多如今正值创作高峰的作家曾经共同走过的足迹:从懵懂无知的童年,到青涩稚嫩的少年,从热血沸腾的青年,到稳健沉静的中年——“四十年来,我亲眼目睹了乡土中国在时代洪流中发生的深刻变化,我的乡村经验,天然地与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进程血肉相连,无法分割。多年以后,当我终于拿起笔写作的时候,那些波光和云影,那些沉

默和喧嚣,那些大历史中耐人寻味的精神细节,那些大时代风潮中闪闪发亮的人性光彩,必然会化为文字,成为我作品里最为打动人心的部分”。

中国文学要义不容辞地参加世界竞争

改革开放,不仅是一代代作家在蓬勃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和创作的过程,更是中国文学从单元的文化背景走向多元、开放、共通共融的广袤世界的过程。在作家曹文轩看来,中国文学当下格局的构建,与中国文学不断置身于广阔而深邃的国际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自“五四”以来,外国文化真正开始对中国文学发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尼采主义对鲁迅早期创作的影响、西方浪漫主义对郭沫若的作用、法国文学对巴金的滋养、契诃夫戏剧对曹禺的启发、流浪巴黎街头的‘世纪末’诗人和以描写俄罗斯乡村生活见长的忧郁型诗人叶赛宁对艾青气质的感染,都是一些几经证明了的事实。”其后,苏俄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使得中国有相当数量的作家,明显地具有普希金、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文学精神。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沉寂后,改革开放不仅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大量译介作品,文化交流活动激增,思维激荡活跃,“40年,中国文学在这样一个由我们自己主动接受而不是别人强加于我们的国际文化背景之下,开始了它的黄金时代”。

同样从寂寥中走向辉煌的,还有诗人叶延滨记忆中的中国当代诗歌。40年间,他亲历了中国诗歌的发展,见证了诗坛的沧桑巨变。(下转第6版)

风景如画的云顶村里,热情为民的年轻村长方春天,在筹备莅临本村的一场国际山地马拉松分站赛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棘手问题。面对利益的诱惑、亲情的考验、耳畔的质疑,这位选择从城市返回乡村故土的年轻村长,将如何奋力跨过脚下的荆棘,为心中的梦想向前奔跑?

近日,这部从一场途经乡村的国际山地马拉松赛巧妙引出我国东部农村基层治理和发展振兴的电影《春天的马拉松》,于全国院线正式上映后广受好评。12月21日,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研讨这部现实题材主旋律农村电影的创作得失。会议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和上海广播电视台主办,并获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支持。

在研讨会上,亲历了影片创作全过程的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郦国义将影片获得成功的原因归纳为:把中国乡村战略政策的宏图挂在心里,在人物塑造上把握住了时代特征,在现实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了美感。而他对这部电影的评价,也与专家们对这部电影的观感互相印证。“要想读懂中国,需从农村开始;要想理解社会,需从基层起步。这是一场奔跑在长三角广阔沃土上的马拉松,也是新时代改革再出发的马拉松。波澜壮阔的改革伟业反映在电影中,投射出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36条’这一个闪光的切面,围绕它产生的一系列戏剧冲突,

也就是新农村建设中不同群体利益和不同人性诉求的现实遭遇。”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在发来的贺信中写道。

浙江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范志忠称这部电影“充满了泥土气息”。充满诗意的镜头掠过宁海的民宿、风车、云海、竹林、茶园、民俗,这些既传统宁静又有现代气息的场景,勾勒出了一幅新时代的乡村风貌,也展现了江南独有的农村文化的气息。“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放映这部电影,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农村的经济改革作为起点,而这一部电影,恰恰展示的是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新起点。”

电影主人公方春天的形象也让人耳目一新。与会专家表示,作为城市中的成功人士,方春天返乡第二次成长,立志报效家乡实现“云端梦”,可说是“乡村干部中的小清新”。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表示,自己就是从乡村走出来的,现在还跟乡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年回去了解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情况。“如果不是对乡村现实有所了解,电影不能把这一带的农村现状表现出来。事实上,很多大学生村官在乡村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但方春天原本是村里的学生,考进大学走出乡村,又为了实现自己理想回报乡村,避免了身份的简单化。他的形象与传统的村长形象也很不一样。在电影中,方春天没有发过很大的

火,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很激动,却在平静中表现出了激烈的内心冲突。这种平淡风格的追求,和整个自然环境生态也是一致的。”

与川剧“变脸”齐名称为“西脸东牙”的绝活平调耍牙、传统婚嫁风俗十里红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金彩漆……这些深具宁海特色的传统文化“彩蛋”,也很好地与影片的叙事节奏融为一体。“泥金彩漆是叙事惊喜,宁海平调是叙事高潮,最后的十里红妆充满了叙事情感,当情感很高亢的时候,十里红妆跟大团圆的戏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上海师范大学影视系副主任赵宜表示。

一部主旋律现实主义作品,从主题立意到人物塑造,从传统风俗到人情世故,收获如此多的赞誉,秘密何在?“主旋律电影最难做到的是信,现实主义创作如何拍出那些动人的细节,如何拍出生活的真实,如何让观众看到他们愿意看到并且愿意相信的人物形象,而不是来自预设的概念?”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导演郑大圣在提出一连串的发问后,将答案归纳为“找真人,找真事”六个字。而电影就取材自浙江宁海推行《村级权力清单36条》过程中发生的真实故事。

一部艺术作品的成功,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找真人,找真事”六个字上,如何将真人真事“化”为令人信服的艺术作品,整个主创团队付出了无数心力。据悉,电影开拍之

前,导演夏晓昀便带着编剧和主创在当地做了非常深入的考察。为了精益求精,主创团队甚至放弃了立足于采风、花了两年时间打磨出来的本子,并邀请熟悉和了解当地生活的宁海作家张昱参与创作,才打磨出了最终的剧本,才有了被郑大圣评价为“耐心地观察乡间人们最普通的琐碎日常,不回避客观存在的现实矛盾,温润节制有保留地含着批评,体现出知性的态度”的“春天的故事”。

春天的云顶村,云霞蒸腾,万物生发。如此良辰美景,正是明人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中写道:“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从这部电影的风景中,祖籍宁波的评论家毛尖见到了“吾乡吾土”,亲切之感油然而生。“《春天的马拉松》对风景的拍法与其它农村电影有不同之处,它不是在拍明信片片和拍景点,而是在拍家乡风物。如果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便可以产生更好的效果。举个例子,侯孝贤在《恋恋风尘》中拍的风光,很有绵延感,男孩子失恋回到家乡,在家里种番薯,抬头看到远方的山、远方的云、远方的田野,风景最后绵延到人心上来,对人有治愈作用,能引发普通人心头的乡愁。从这个意义上说,银幕地理非常重要,中国电影可以在表现地方风物上再加把劲,在银幕上重建中国电影在风景风物上的抒情能力。”